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胁迫之术

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

辛普森 (Christopher Simpson) 著

王维佳 刘扬 李杰琼 译 (1945-1960)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赵月枝 吕新雨 | 主编


胁迫之术：

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

辛普森（Christopher Simpson）著

王维佳 刘扬 李杰琼 译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美)辛普森著;王维佳,刘扬,李杰琼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001-7

I. ①胁… II. ①辛…②王…③刘…④李… III. ①大众传播—传播学—研究—美国

IV. ①G20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8025 号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FIRST EDITION

by Christopher Simpson

Copyright © 1994 by Christopher Simpson

SCIENCE OF COERC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 1945-1960,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4.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5-151 号

批判传播学·译丛系列

胁迫之术:心理战与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1945—1960)

主 编 赵月枝 吕新雨

著 者 (美)辛普森

译 者 王维佳 刘 扬 李杰琼

责任编辑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吴元瑛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001-7/G·10017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冷战期间，杜鲁门总统公开进行的宣传攻势“真理运动”（Campaign of Truth）、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进行的隐蔽宣传行动形成了一场总体的心理宣传战。其中，美国之音起到了重要作用。上图是1948年3月18日，苏联裔的广播员Victor Franzusoff正在通过美国之音向苏联方播送当天节目。

“批判传播学”编委

丛书总顾问：童兵

丛书编委（排名不分先后，以中文首字笔划为序）：

丹·席勒（Dan Schiller，美国）

冯建三

吉列尔莫·马斯特里尼（Guillermo Mastrini，阿根廷）

孙皖宁（澳大利亚）

邱林川

林春（英国）

珍妮特·瓦斯科（Janet Wasko，美国）

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英国）

胡正荣

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国）

特里斯当·马特拉（Tristan Mattelart，法国）

斯拉夫科·斯普里查（Slavko Splichal，斯洛文尼亚）

童世骏

葆拉·查克拉瓦蒂（Paula Chakravartty，美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资助

总 序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发展的转折点,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危机不断加深。如何面对这些问题,全世界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都面临挑战。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想象与信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消亡,反而在这些新的问题与危机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生机。马克思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正以不同的方式复活。

与此相联系,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体系与制度,一方面作为技术基础和经济部门,一方面作为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和民主社会的基础,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而转型中的巨大困惑和危机也越来越多地激发人们的思考。一系列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做出清理与反思。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理论资源的批判传播研究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朝向更平等、公正的方向转型,并为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与方法,探索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批判理论的新路,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做出及时而有效的回应。

由于中国问题和传播问题是讨论全球化危机与出路两个重要领域,中国传播学界具有担当起自己历史责任的义务和条件。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在 20 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

史地位，在全球视野中整理、理解与反思这一理论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这一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发展，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个全球视野不仅面对西方，同时更向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开放，并希冀在不同的比较维度与视野中，重新确立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立场、观点与方法。

近一个世纪前，在1929—1930年的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后的欧洲，在法西斯主义屠杀共产党人、扼杀左派思想的腥风血雨中，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用大写的“批判”一词代指“马克思主义”，在他们所处的特定的历史语境下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此后，“批判”一词，因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学术思想的内核，几乎成为马克思主义和一切以追求人类解放和挑战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学术取向的代名词。今天，我们不愿也无需遮掩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把本书系定名为“批判传播学”，除了出于文字的简洁性考虑之外，更是为了突出我们的批判立场，强调我们弘扬以挑战不平等社会关系为价值诉求的传播学术的主旨。当然，批判的前提与归宿是建设，批判学术本身即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建设性理论实践。在此，我们对传播的定义较为宽泛，包括任何涉及符号使用的人类意义分享实践以及这些实践所依托的传播技术和知识基础。

本书系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相结合的道路，重新检讨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理论前提的观念、范畴与知识谱系，反思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在历史和当代语境下中国化的成就与问题，探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传播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丰富、发展和挑战，分析当下的经济危机与全球媒体、信息与文化产业的状况和相关法规、政策，以及全球、区域与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传播与社会变迁。我们尤其关注当代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中国传播定位和文化自觉问题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社会现状，社会正义与批判的生态学视野下的信息技术与社会发展，文化传播、信息产业与阶级、种族、民族、性别以及城乡分野的互构关系，阶级意识、文化领导权的国际和国内维度，大众传媒的公共性与阶级性的动态历史关系、文化传播权利与全球正义等议题。我们还将挑战横亘于“理论”与“实践”、“观念”与“现实”、以及“批判传播”与“应用传播”间的简单二元对立，不但从批判的角度检视与质询那

些维系与强化不平等社会关系的传播观念与实践,而且致力于促进与发展那些挑战和变革现有不平等社会传播关系的传播政策、观念与实践,并进而开拓批判视野下的组织传播、环境传播、健康传播等应用传播领域的研究。最后,我们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方法论发展与经验研究的批判性运用,探讨文化研究如何在当下传播情境中更新其批判活力,关注媒介教育、文化赋权和社区与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以及大众传媒与网络时代的大学、学术与跨国知识流通如何强化或挑战统治性知识权力关系等问题。

本书系包括“批判传播学译丛”、“批判传播学文论”和“批判传播实践”三个系列。“译丛”系列译介国外批判传播研究经典文献和最新成果;“文论”系列以专著、讲义、论文集、工作坊报告等形式展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批判传播学研究的前沿;“实践”系列侧重传播实践的译作和中国经验,包括有关中外传播实践和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卓有成就的中外传播实践者有关自己的传播劳动和传播对象的反思性与传记性著作、以及富有批判性的优秀新闻作品。

华东师范大学—康奈尔比较人文研究中心(ECNU-Cornell Center for Comparative Humanities)和2013年7月成立于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是这套书系依托的两家专业机构,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支持。宗旨是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和跨文化全球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推动中国传播学术的创新和批判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尤其是新一代批判传播学人的成长。

在西方,面对信息资本主义的持续危机,“马克思回来了”已然成了当下批判传播学界的新发现、新课题和新动力。在中国,在这片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初就被一代思想家和革命家所反复思考、探索与实践的古老土地上,我们愿以这套书系为平台,为发展既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学术主体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需要对过去一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与实践做出深刻反思,需要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与实践前沿建立有机的联系,需要在克服媒介中心主义的努力中与国内外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产生良性互动,更需要与各种不同的传播研究学派、观点进行真诚对话,彼此砥砺,以共同

加强学术共同体的建设,推动以平等与民主为目标的中国社会发展,促进以和平与公正为诉求的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建立。

是所望焉。

中译本序言

知识的积累与演进是现代性进行自我确证的关键依据。与此紧密相关,知识分子对真理的真诚追求、科学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都早已成为现代学术事业的道德准则。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科学精神,这些专业伦理有着令人崇敬的品质,并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多卓越贡献。然而,当人们片面强调现代知识的自主性和普遍性,以至于对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因素视而不见时,这些崇高的伦理却可能沦为矫饰霸权的意识形态,走向“学术自由”的反面。

《胁迫之术》给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正如此书的副标题所指,美国传播研究的兴起和传播学科的构建离不开冷战时期国家心理战工程的资助和引导。本书作者,美利坚大学传播学院教授辛普森通过大量档案材料的研究为我们展示了二战后几十年间,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美国军方、情报机构、政府部门、重要的基金会组织等如何推动传播学者们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等课题的研究。这些以宣传和胁迫为目的的研究项目不但在传播学“奠基人”的选拔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帮助确立了学科的核心问题与主导范式。

在辛普森的著作中,传播学领域众多耳熟能详的顶级学者和研究机构纷纷以服务于“帝国统治技术”的工具性角色出场,然而这并不妨碍他们在知识分子的学术圈中展现独立、客观、科学、进步的面貌。在核心学术刊物和重要的学术会议上,他们只需要把心理战项目的研究报告裁剪

打磨成科学研究论文，就可以树立一座座传播研究的里程碑。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不但奠定了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方向，而且成为日后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现代化的标杆。

值得注意的是，外部权力对学科的规制还不仅仅体现在引导、资助等正向手段上。在冷战高潮时期，警察制度、同行压力和学院政治联袂配合，“积极压制那些站在反对立场上的传播学观念，特别是那些他们视为具有颠覆性的批判思想”（见本书第9页）。当年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很多批判传播学者都曾经历过这段艰辛岁月，恰如作者所言“对传播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非正统分析可能会招致职业共同体的学术驱逐、联邦调查局的恶意审查、媒体的攻击，甚至是暴力袭击”（见本书第9页）。

在同情这些学者尴尬处境的同时，我们也该警醒，主流传播观念的形成，并非线性进化的结果，它离不开这段外部权力对多样性思想进行选择 and 压制的历史。这一点，恐怕正是那些长期将美国传播学研究历史当成正统的科学学术史、思想史来研读的学者们的盲点。

当然，建构学科正统性和学术独立性的神话本身就是权力规制的内在需要。如果缺少了正统性和独立性的认定，不仅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传播学者不会轻易将这些心理战成果奉为真经，恐怕美国主流传播学界内部也会面临严重的道德合法性危机。那么，当时传播学科的领军人物是如何将“冷战斗士”和“进步学人”的双重面目缝合在一起的呢？

要完成这个任务，所需的不仅是体制的提拔和学术包装的技巧，更重要的是一套自我确证的观念装置，是那种处于文明秩序制高点的迷之自信，那种宗教热忱一般的普世责任感，那种带领人类社会由蒙昧走向现代的自诩进步意识。要理解冷战时期美国学术精英的行为动机，这套观念装置可能比国家资助所塑造的表面风光和单纯而抽象的“爱国热情”更为重要。它是主流传播学者为自己学术事业创造合法性的德性源泉。

美国很多冷战政策的研究成果虽然为我们展示了重要的历史事实，但是对于上述意识形态因素的挖掘还显得比较薄弱，多数也不太涉及这些政策与重要国际历史背景的关联。《胁迫之术》一书更多聚焦于心理战与传播研究之间的关系上，大量的证据材料有助于我们廓清传播学兴起的具体情境。然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些关系和情境，并不能停留在人道主

义的层面上进行指责和质问,还须对这套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形成的历史和政治逻辑有更多深入的理解。

我们可以将冷战社会科学的兴起看成是有数百年统治经验的帝国主义面对新的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一种回应。帝国体系的危机是二战之后老牌殖民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源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朝鲜战争的失利、古巴革命的成功和众多新兴国家脱离殖民体系等政治事件,更主要来自西方文明等级秩序这个全球治理法则背后的“道统”所面临的质疑。从联合国人权宣言到经济领域、信息传播领域等一系列的“新秩序”倡议;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替代方案在西方阵营内外的兴起到“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所代表的独立自主意识,一个焕发着勃勃文化生机,同时又给不平等秩序的维护者带来严重威胁的新世界呼之欲出。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被小施莱辛格称为“至关重要的核心”(The Vital Center)的美国文化政治精英们承担的不仅是“国家”的使命,而是所谓“文明”的使命。他们一方面要在暗中施行强力手段挫败世界范围内的激进运动;另一方面又要重塑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领导权和全球文明等级秩序。而历史已经证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为了在伊朗、埃及、朝鲜、菲律宾、危地马拉和越南等众多地区遏制民主革命力量的崛起,国家冷战机器对各种颠覆手段和“统治技术”的需求不断扩张。心理战工程及其资助下的众多传播学项目聚焦于说服效果、军队士气、态度改变、刑讯审问等“胁迫技术”的研究正是对这种需求的回应和满足。

与此相伴随,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传播研究在“发展”和“现代化”领域引人注目的成果又为重塑西方世界的道路自信和文化感召力奠定了基础。冷战社会科学所推行的发展主义和现代化理念在政治内涵上并不是20世纪的创造发明,而是古老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和帝国主义文明等级论的延续和改良。这些观念在不平等秩序遭遇危机时以现代科学的面貌重新登场,与各种革命理论奋力抗争,并在之后的历史中取得了显著的优势。

就这样，美国社会科学家把马基雅维利式的权谋和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前者是后者实现的必要手段，而后者又给前者创造了不可或缺的道德合法性。离开这种认知一致性的构造，我们就无法理解冷战时期的传播学者如何能心安理得地从事“胁迫之术”的研究，并将其当成一项科学进步事业来看待。

回到这段冷战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更能体会，当“科学是无国界的，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句名言从一位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口中说出，它所表达的真实政治含义是什么。与披着主权国家外衣，行使维护“帝国文明秩序”强权的“军事—科技”机器刚好相反，这里的“祖国”恰是对一种反霸权集体意识的召唤，是追求平等的知识分子们对精神家园的渴望，更是建立一种新型世界秩序的根据地。“科学家有祖国”不是对民族身份和国家主权归属的静态承认，而是对胁迫性学术秩序的告别与否定！

当这个意义上的“祖国”退化为“国家利益”、“国际一流”、“国际高水平”等被挖空了政治含义的概念空壳，当发展中国家社会科学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范式唯欧美主流学术圈马首是瞻，当各种冷战社会科学核心刊物上的文章发表数量成为认定学术成果质量的最高标准，这就意味着那种对知识自主性的不懈追求令人遗憾地中断了。如今，压制与反抗的年代终究远去，全球学术政治的等级体系得以重建，并在后危机时代掩盖了曾经的狰狞面目，展现着它一定程度上的温和与包容。

带着对美国战略传播工程研究的共同兴趣和揭示主流传播学正统性神话的探索意愿，刘扬、李杰琼和我三人合作完成了本书的翻译。作为后冷战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我们几位译者都经历过主流社会科学范式的洗礼，由此也期待《胁迫之术》的出版能够给更多中国传播学界的朋友提供一个反思学术自主性的机缘。在本书翻译和校译的过程中，加拿大传播学者赵月枝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的吴畅畅老师、北京大学的研究生翟秀凤、方晓恬和人民日报社的殷鹏等朋友都提供了热心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王维佳

2016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中译本序言(王维佳).....	1
第一章 定义心理战.....	1
第二章 世界大战与早期的现代传播研究	15
第三章 “社会科学者们做出了巨大贡献”	33
第四章 学界的倡导	44
第五章 政府的前哨	56
第六章 “同生死共患难的伙伴”	71
第七章 主导研究范式的国际化和强化.....	108
第八章 心理战的遗产.....	123
附录:斯图亚特·多德“里维尔相关论文”系列清单	137
研究文献概览.....	142

第一章 定义心理战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传播研究是一个不那么重要,却又十分有趣的分支。这个相对较新的专业在1950年到1955年间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形成了完备的学院和课程体系,并能够独立授予博士学位。如今,这个学科承担着培养新闻记者、公关和广告从业者等相关专业技能人才的任务。在时下的美国,这些人才可被称为“意识形态工人”。^①

在大众传播研究形成一个独立学术领域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心理战项目起到了重要扶持作用,深深影响了学科带头人的选择。在传播学众多研究范式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心理战项目的资助决定了哪种研究范式可以得到最多的垂青,进而获得繁荣的发展前景和繁复细致的研究。国家虽然不会直接决定专家们说什么或不说什么,但是它确实对该学科领域权威人士和权威声音的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

本书有三项任务:首先是勾勒1945至1960年间美国心理战的历史脉络,并探讨这项传播事业的基本理论、行动和管理结构;其次是考察那些著名的大众传播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对心理战事业的贡献;最后,还将检视这些心理战项目,是如何影响传播研究领域对于传播和科学研究的普

^① 有关“意识形态工人”的问题,如今不计其数的大众传播机构在招募广播电视记者、报纸杂志编辑、作家、各种广告专家、公关人员(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说法称之为“大众传播”专家)时,都对拥有大众传播学专业高等学位具有一定的要求。参见 W. W. Schwed, “Hiring, Promotion, Salary, Longevity Trends Charted at Dailies,”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October 1981); Lee Becker, S. W. Fruit, and S. L. Caudill, *The Training and Hiring of Journalists* (Norwood, NJ: Ablex, 1987)。

遍理解。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行动常常与大型广告主、媒体公司的商业野心、高校管理者和教授们的创业欲望交织重合。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等军事情报部门和宣传机构大幅资助了战后一代的传播学者从事说服技巧、民意测量、刑讯审问、政治与军事动员、意识形态宣传和其他相关的课题。特别是其中的说服研究，还为现代广告和动员技术奠定了科学基础。这些政府资助的传播研究，单靠私人财力根本不可能完成，更不用说政府还可以调用大批军队士兵充当研究和实验对象。^①

战后美国最重要的传播研究机构中，至少有六家事实上是政府心理战工程的附属物。多年以来，政府资金（经常未向公众公开）占很多研究机构年度预算的75%以上，例如以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以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为代表的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ocial Research），以及以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为代表的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等等，都是这样的机构。^②

① Albert Biderman and Elizabeth Crawford, *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Social Research: The Case of Sociology* (Springfield, VA: Clearinghouse for Fede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formation, 1968).

② 有关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所，参见 Jean Convers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pp. 269, 275—76, 506—7 notes 37 and 42.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有关坎特里尔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社会学研究院，参见 John Crewdson and Joseph Treaster, “The CIA’s 3-Decade Effort to Mold the World’s Views,”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5, 26, and 27, 1977, with discussion of Cantril and the IISR on December 26. 坎特里尔的译本中隐瞒了资金的真实来源，参见 Hadley Cantril, *The Human Dimension: Experiences in Policy Research*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7)。有关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参见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 Description*, (Cambridge: MIT, July 1955);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and Internal Defense, Report of a Country Team Seminar, June 11 - July 13, 1962*; (Washington, DC: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1962); 以及 Ithiel de Sola Pool, “The Necessity for Social Scientists Doing Research for Governments,” *Background* 10, no. 2 (August 1966): 111—22。其他大众传播研究项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是美国政府心理战研究机构，这些机构包括美国全国舆论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调查研究中心（现在更名为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下文将详细讨论。